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

几度‘康乐村”

金明德

60多年前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《我家搬进康乐村》,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“我”家终于住进了一套装有自来水的新房子,再也不用忍受“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;外面雨停了,屋里还‘滴答滴答’下个不停”的窘境了。

这篇课文我铭记了一辈子,似乎写的就是我家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家搬到了政府在南郊菜地里新建的清凉新村(俗称“老六幢”),尽管七口人仅有20多平方米居住面积,但却有南北两个房间和前后走廊。热天我和弟弟在走廊里睡觉,冷天每晚就在屋里搭起临时床铺;尽管没有厨房和卫生间,但可在走廊上放置煤球炉做饭,屋外还有公共厕所;不久政府又来安装了公共自来水,一分钱一担水,再也不用挑河水。我家也从此结束了到处租借私房的“动荡”生活。为此,那年“小升初”考试,凭着一篇描写清凉新村生活的《我的一家》“优秀作文”,顽童我居然考取了全国红旗学校常州市第一初级中学。

至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在经历了知青下放和当矿工计20年外地职业生涯后回到了常州,两年后分得清凉新村一套59平方米的七楼公房,虽没有电梯,却有南北两房并配有小客厅和厨卫间,采光和通风极佳,我高兴地念叨“我家搬进了康乐村”。1991年常州遭受洪涝,平顶的屋面共有37处漏水,我一面背诵着“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……”的课文,一面疲于奔命地用各种盆罐锅桶接水。雨停后公家来维修了屋顶,从此不再漏雨,一家4口复归其乐融融,两个孩子每天在窗口的长桌上做作业复习功课,并先后考取了大学。

1997年我在政府的帮助下,贷款6.5万元,买了一套79平方米、坐落在离大运河不远的龙游河畔的安居房,又借了3万元进行装修。入住时亲朋好友前来祝贺,都赞扬说“鸟枪换炮”啦,我再次喊道“我家搬进了康乐村!”至2012年退休,我的贷款也正好还清,从此成为了这座住宅的真正主人;我还在父母亲在世时帮助他们买下了清凉新村的“老屋”,从此结束了我家世代没有自有住房的历史。

一眨眼,我居住安居小区已经22年。很多条件好的人家早已另觅新房去了,搬家时把家具统统换新,扔下的物具造成物业管理上的很大难度。而我却守着这已显陈旧的住房和简陋的家具,外加满屋的书籍,发自内心地感到我的居住条件已经小康了。

小康不小康,要看追求和欲望。不论是同年轻人讨论“人的追求”,还是给青少年传承“红色基因”,或是演讲《人生与读书》之时,我总是宣传这样几个观点:一是怎样比较。俗话说“人比人,气死人”,就看你怎样比,我的建议是少作与他人的横向比较,多作同自己的纵向比较,现在总比过去好,就会有满足感;二是怎样做到心理平衡。每当你感到不平衡时,请看看窗外:万千劳苦大众都在为生存而奔忙,他们中的很多人出力流汗比我们多,可得到的往往比我们少,这样你就平衡了;三是高低标准:一定要满足物质生活的低标准,但永不满足精神追求的高标准……

地名闲话 / 曹春保

社 头

社头一隅

社头,金坛境内为数不多、清代就被列为古镇的街镇。考析地名来历,“社”旧指土地神;“头”为首之意,泛指第一。相传旧时这里“集社(即庙会祭祀)”活动盛大,居金坛西南之首,故得社头之名。有关“集社”活动盛况,不仅为市民口口相传,而且民间史料多有记载。镇北东周村《周氏家谱》中,就有“垂拱二年(686)五月初五,临村张桥集社……盗匪活动猖獗”等记载。

社头街镇位于金坛西南,民国三十六年(1947)改为乡,1988年撤乡建镇。作为乡级体制,社头东接洮西、指前,西邻罗村,北靠唐王,南界溧阳后周。乡政府驻地社头集镇,旧街呈“T”字型,为青、砂条石铺陈,街面宽3米左右。中巷和后巷的巷道为方形青石铺设,间有5座庙宇和朱家祠堂及大小商店数十家。这种规模莫说是西南山区,就是金坛范围也堪称为“大”,频繁的庙会活动和商家等促销手段,给集镇带来持久的繁荣。

社头街镇默默记下良医惠济众生的点点滴滴。一代名医马步云,14岁进入儒林“树德堂”药店学徒,16岁拜师成“树德堂”弟子,由储氏名师言传身教。他20岁在社头街镇挂“长生堂”招牌,坐诊行医,创下“救贫贱之危”等口碑。39岁被召儒林“树德堂”坐诊,使悬壶挂幡、禀承祖业的储氏“树德堂”换了姓氏。马步云作为金坛儒林“树德堂”第16代传人,不忘医学传家,使妇科医学愈发地光耀。他的儿孙接受“良医”思想的启导,其孙马卫东就有“小步云”之称。

社头街镇蕴积丰厚的孝义文化。最典型的是集镇西侧的洪母村,村民将崇尚孝贤作为传世之尊,以孝义教诲子孙,并与爱国爱民紧扣一起,实现孝义的最高境界。1972年,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挖掘的“大宋蒋氏夫人墓铭”碑石,由政和二年(1112)进士谭知柔撰写。碑文中褒扬提倡的孝义、礼德,正是中华民族持恒传承的优秀文化。如今,这块碑石珍藏在戴王府内,供文史和书法爱好者鉴赏。

社头街镇是金坛西南重要门户,因此屡遭劫难。太平军攻下溧阳,重兵进攻金坛,街镇竟成清军和地方豪绅防御的前沿阵地,太平军在此遇到从未有的激烈抵抗。于是,这里便承受着一场更为残酷的杀戮,双方以死相拼,尸体多达二万多具。活着的兵士目睹此景,潸然泪下:“太平军杀清妖,本为救穷苦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,手足相残至此,太平军,不太平,痛哉!”腥风血雨后,太平军似有所悟,斟酒化纸祭奠亡灵,在西徐油坊桥下和毛岸两处坟场,立下“兄弟姐妹墓”碑。后来,太平天国政权被清王朝摧毁,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,清廷又推倒太平军竖的“兄弟姐妹墓”改“万人墓”碑石。

社头街镇有抵御外寇侵略的历史。民国二十七年(1938),日本鬼子侵占金坛后,驻扎在洮西下新河集镇的鬼子小队,经常到社头街镇进行“清乡”扫荡”活动,胡作非为,无恶不作,古镇乡民自发地组织抗击,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,一把火烧掉街镇800余间房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社头街镇建设步伐不断向外拓展,集镇的文化设施得到了改善。改革开放之初,街道浇灌成混凝土路面,西街盖起幢幢新楼,商业网点和市面有序往河东开发,狭窄的“T”字型变成了崭新的“口”字型街镇。在新世纪初的行政区划调整中,社头合并为指前镇。 作者供图

名人研究 / 盛承懋

盛宣怀与长三角的早期发展

长三角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,加之有着发达的水系,丰饶的土地,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,使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城市群。

清代,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9座较大的城市,商业、手工业、纺织业及其交易中心南京、杭州、苏州、松江,粮食集散地扬州、无锡、常州,印刷及文具制作交易中心湖州,上海此时已成为沿海南北贸易的重要商业中心。

鸦片战争后,上海等五个东南沿海城市被辟为商埠。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,迅速成为近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外贸中心,由此人口激增。1843年上海仅有23万人,至1890年已超过100万人,增长近4倍。自太平天国、小刀会起义时,洋人放弃“华洋分居”的规定,房地产交易日益普遍。人口增长加之经济的繁荣,使得房地产在上海得以快速发展。

这个时期是对外开放条件下商品经济初步大发展时期,外国商品开始涌入中国,中国原料型产品开始向外出口,外商贸易与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。1847年,英国丽如银行率先抢滩上海,一批外国的银行相继进入。同时进口替代性的早期现代工业也开始发生发展。

与此同时,一批思想先进的人士开始探索中国的富强与御敌之路,他们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实业,才能使国力强盛,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。盛宣怀就是抱着这种思想创业的。不仅如此,他经办的实业,也直接或间接地为长三角、为苏锡常城市圈的早期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一

1880年秋,李鸿章批准筹备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,成立天津电报总局,委派盛宣怀任总办。次年初,盛宣怀拟定了《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路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》。为了加快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,他聘请丹麦洋监工霍洛斯制订了详细的工程进度计划,在与霍洛斯反复商讨后,确定“材料及应用器具,必须分布各段以便临时取用,拟以二百里左右为一段,分作十六段为存材料处,除天津、临清、济宁、清江、镇江、上海、苏州七处本须设局外,其余兴济、连镇、故城、史家口、夏镇、台儿庄、宿迁、高邮、常州设存放物料栈房九处,已经酌妥,二等分局应设几处,再行随时督定”。此时,他将长三角的上海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等城市均纳入了津沪电报线架设的重要节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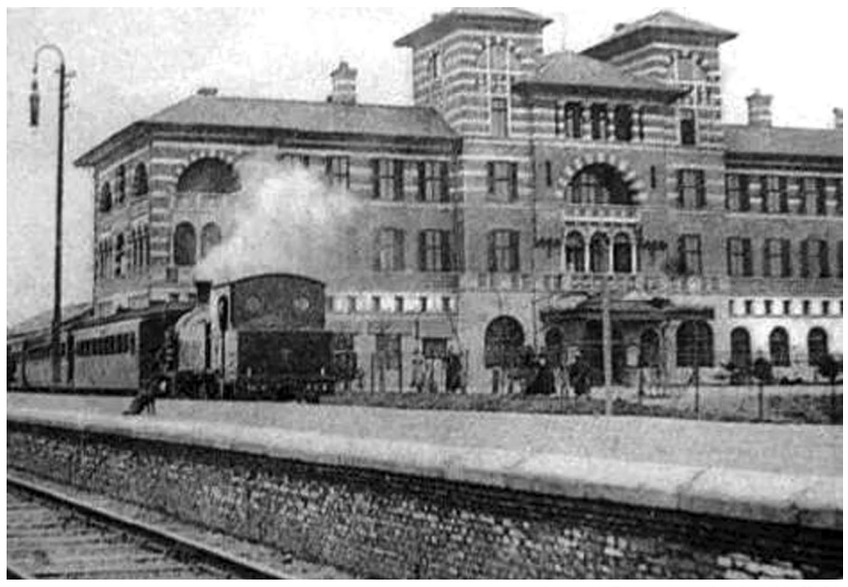
1881年4月,在他的主持下,中国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架设工程,从上海、天津两端同时开工。7月5日,上海端第一根电线杆,在南京路大北电报公司(近外滩)门前竖立。8月,电报线架至苏州,8月中旬上海苏州段试行通报。9月初电报线架至常州,月末南路即造至镇江,北路工程亦进展顺利。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及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,至12月24日,历时250多天,全长3075华里的津沪电报线路全线竣工。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,1881年12月28日正式开始营业,收发公私电报。盛宣怀通过架设电报线,第一次将苏州、无锡(当时行政上隶属常州府管辖)、常州等地与当时长江下游最发达的上海,从通讯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

随着电话技术传入中国,19世纪70年代后期,上海轮船招商局为保持与码头的联系,从国外买回一台磁石电话,拉起了从外滩到十六铺码头的电话线,这是中国最早投入使用的电话。1903年,湖南人马伯亥在盛宣怀的支持下,于苏州阊门创办电话公司,公司只有一部24门磁石式交换机。第一批用户是江苏巡抚衙门、藩司、臬司、织造府、苏州府、总捕府等99个中上级衙门以及苏州商务总会、电报局等,这是江苏省的第一个市内电话。

1908年,在盛宣怀的关心下,常州官督商办的电信邮政业务机构正式设立,电话业务相应展开。常州最早的邮电局设在第一大户庄氏的集居地“庄家场”。这为常州与外地,特别是与上海、苏州、无锡的通讯联系,创造了更便利的条件。

二

1872年12月23日,李鸿章向清廷奏呈了《论试办轮船招商折》的奏折。鸦片战争之后,随着外国航运势力的入侵,原先国内承运漕粮的沙船业迅速衰落。漕粮运输事关国计民生,如何解决由沙船业衰落导致的漕运困难,成为清廷亟待解决的大难题。李鸿章认为必须将“漕运”的利权掌握在中国企业自己的手中。创办轮船招商局,可以使漕运困难迎刃而解。



沪宁铁路建成不久的上海北站

早年的常州邮电局

1873年1月14日,轮船招商官局在上海正式开始营业。9月9日,李鸿章任命29岁的盛宣怀出任轮船招商局的“会办”,兼管运漕、揽载。这是继之前任命“总办”“会办”之后,招商局第三个到位的高管。

轮船招商局在与西方列强和国内守旧势力的反复抗争中前行。1885年8月1日,李鸿章委任盛宣怀为轮船招商局第一任督办。随着航运业务的迅速扩张,招商局在国内外重要港口设有分局,极大地扩展了招商局航运业务的范围,争回了被西方列强夺取的部分航运利权,使轮船招商局开始成为外商航运轮船公司有力的竞争者。

轮船招商局的发展,给苏锡常地区的漕运以及客货航运带来了大量的商机,“其时,轮船招商局设在上海的苏州河畔。同时在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等地都设立了轮船分局。”

轮船招商局的发展,使得小火轮船取代了以往的沙船、帆船、木船,新式航运将苏州、无锡、常州与上海进一步拉近了距离,加快了苏锡常与上海之间人流与物流的传递。这可以说是盛宣怀对长三角早期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。

三

甲午战争战败后,清政府提出救亡图存的六项“力行实政”,并把修建铁路置于首位。1896年9月2日,张之洞向清廷推荐“由盛宣怀督办铁路最为适当。因盛兼商业、官法、洋务三者之长”。10月20日,光绪皇帝下旨:盛宣怀“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”,并被授予“专折奏事特权”。

1897年1月,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于上海。盛宣怀向清政府奏明,“先造卢汉干路,其余苏、沪、粤、汉次第展造,不再另设立公司”。

1898年,英国政府以最惠国待遇为由,向清政府索办沪宁铁路,最终,由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《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》,准许英商出资承办沪宁铁路。1903年又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,先后共借款290万英镑。

1905年4月25日,沪宁铁路分成上海—苏州、苏州—常州、常州—镇江、镇江—南京四段同时开工建造。盛宣怀作为铁路总公司督办,亲自主持了沪宁铁路的开工典礼。

1906年7月16日,苏州、无锡两站同时举行通车典礼,两天后即开办营业。又经过不到两年的工程建设,沪宁铁路于1908年4月1日全线通车,线路全长311公里,由上海北站至南京下关站,沿途设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南京等37个车站。

沪宁铁路的通车,再次拉近了苏州、无锡、常州与上海的距离,为中国长三角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四

甲午战败后,在盛宣怀受到重用,督办铁路,接棒汉阳铁厂之时,他询问自己:钱从哪里来?1896年11月12日,盛宣怀提出:“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,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。这就要铁厂、铁路、银行三者一手抓。”他在向光绪皇帝上奏的《自强大计折》中说:“银行流通一国之货财,以应上下之求给,比之票号、钱庄要好。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本之银行推行来华,‘攘我大利’,近年中外士大夫亦多建开设银行之议。现又举办铁路,造端宏大,中国非急设银行,‘无以通华商之气脉,杜洋商之挟持’”,强调了中国人办自己的银行的必要性与迫切性。

当年11月12日,光绪皇帝下诏,命盛宣怀“选择殷商,设立总董,招集股本,合力兴办,以收利权”,着手筹办银行。盛宣怀随即就行动了起来。

由于盛宣怀事先对开办银行已有了较为成熟的考虑,在奉到上谕的十几天后,就召集了由他选定的既有经济实力,又有管理近代企业经验的八位殷商(后又增加两位)组成的董事会,盛宣怀将自己所办的银行定名为“中国通商银行”,简称通商银行。

盛宣怀筹组银行之路充满着荆棘,但他并不为之动摇与罢手,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,1897年5月27日,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成立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,也是上海最早成立的华资银行。

随着通商银行的设立,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,镇江、扬州、苏州等处也设有分行,业务盛极一时。

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,为上海开办新式银行作了先导。显赫一时的私人银行“南三行”,即总部都设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、浙江实业银行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,成为中国金融界极为耀眼的新生力量。“南三行”的后起之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,其总经理陈光甫成为近代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焦点人物。1920年陈光甫为了拓展吸纳储蓄业务,在常州西瀛里开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常州分行,由于其经营灵活,管理严格,服务信誉高,很快名列常州各商业银行之首,也为常州与上海资金的快速流通,创造了条件。从此,苏锡常与上海之间的资金流也纳入了快速通道。

盛宣怀对长三角早期的重大贡献,是从产业基础上为苏锡常融入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创造了条件,通过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、资金流与长三角的龙头上海,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,使苏锡常成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圈中的重要成员。

资料图片

谈天说地 / 谢燕红

新闻及周边的“集”与“节”(下)

我们这里的农村,比落上更热闹的日子是“做节”。这个“zuo”(阴平)字怎么写,我也没有把握,写作“做”或“筑”,大概都不错。“做节”是指在每年固定的某一天,一个区域的每个村都当“节”来过,家家户户都要请客。有客人来,某地的人数激增,便自然形成一个“节场”,摆摊的、叫卖的、讨价还价的,人来人往、嘈杂声声,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落上。但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,落上一般从清晨到午饭前结束,所以到落上去要赶早。去晚了,有些东西就买不到了,或者只剩下次品了,挑选的余地大打折扣。节场一般从上午九点开始,主要对象是来附近村子亲戚家吃饭的人,到主人家去吃饭,总要买点水果、糕点之类的,而主人家虽然已提前备好了菜,难免也有疏漏之处,便临时到这里添点菜,所以节场上卖的东西比落上要单纯得多。

我们家附近村子是在每年正月十六这天“做节”,所谓“拜年拜到年十六”。一般地方过了正月十五,一个“年”就算过完了;在我们这里,以十六为“年”的最后期限,这一天“做节”也是各家请吃“年饭”。我家每年的正月十六“做节”,菜是从年前就要开始准备的。爸爸要到城里的表场等菜市场跑几趟,买回鱼、牛肉、鸭、腐竹、豆芽菜等。猪肉和鸡是不用买的,年前家里杀了年猪,肉都腌好了,扣肉也做好了。小年夜祭祖用的一只公鸡,也吊在明堂里,留到正月十六这天吃。木耳、香菇提前两天泡发,一年来没用过的成套的碗、碟、酒杯、调羹都从碗柜深处搬出来,一一清洗干净。正月十六那天,几乎所有的亲戚都会来,老亲戚(爷爷奶奶的姐妹及他们的子女)一般来吃午饭,舅舅一家、阿姨一家、三个姑姑、哥哥的寄爹、妈妈厂里的同事一般都是晚上来,晚饭的菜也要相对丰盛一些,大人都是要喝白酒的。

在我小的时候,村里也不是家家都请客。请客的通常限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,但村民们私下也会议论,说某某家小气,一年到头也不请个人来吃饭。对各家的菜也会有比较,所以各家都会把年上最好的菜留到这一天吃。我们家的一碗扣肉,年前就做好了,奶奶天天拿出来“回火”——放进饭锅里蒸一蒸,这样处理过就不会坏了,可以留到“做节”这天吃。冰箱普及前保存熟食的方法实在有限,基本就是摆放在蒸笼里,白天置于家里阴凉的角落,晚上就移到明堂。这样原始的保鲜方式,自是不可靠的。记得有一年,家里早些时候买回来的卤牛肉端上桌的时候,已经长毛了,只好全部丢进猪食桶。爸爸懊恼不已,后悔不该买那么早,既心疼又觉得丢了面子。我爸妈都是好面子的人,为这个“节”,要花不少钱,特别是爸爸一趟趟地进城采购,乐此不疲。我们村在“做节”这天最有面子的,要数村口的金荣家了,他们家的亲戚都是城里人,穿着体面,讲的都是城里话,带来的礼物是精致的裱花蛋糕等等。金荣家的菜也考究,专门请了厨师来烧,厨师提前一天来“做隔夜”,在门外架起炉子生起火,上面叠起几层蒸笼,呼呼往外喷着热气,也是馋煞人的香气。旁边一群人在处理鱼、鸡、鸭、猪内脏,忙得不亦乐乎。

我外婆家在清明这一天“做节”。清明这天“做节”的地方很多,吕墅桥也是一大中心。外婆家这里并没有形成“节场”,大家吃过饭都会骑自行车去吕墅桥玩。这一天的吕墅桥比哪一个“落上”都热闹,卖东西的摊子绵延两三里地。不记得在吕墅桥的节场上买过什么了,只有满眼的人,鼎沸之声,今日犹在耳畔。

记忆里最深刻的节场是小茅山“做节”,农历的三月十八。那一年我还没上小学,作为双职工的阿姨、姨夫已经分得了在花园新村的公房,经常把我带去玩。那一次正赶上小茅山“做节”,来摆摊的人出奇得多,挤满了怀德路花园新村那一段的路面,车根本不能走,人都挤着过。记得阿姨一眼看中了一把伞,问我要不要。我直点头,那是怎样难挡诱惑的一把伞啊!布料,长柄,明亮的黄色,上面有星星点点的红色小花。阿姨当即叫我站在原地别动,她挤进了人群,一会儿便高举一把伞退了出来,嘴里还在喊着:“轧煞格列,钞票还没付完……”这把伞我一直用到小学二年级,伞面明亮的黄色已褪去,伞骨上爬满了红锈,而街上开始流行折叠伞了。